

文化认同: 客家族群认同的表达与实践

陈海斌

(赣南师范学院 客家研究中心,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 客家人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族群认同是对自身身份与文化的认同, 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本质与心理基础。客家的文化认同通过客家文化结构中的文化要素进行表述, 认同作为亚文化的客家文化正是对于中原优秀文化的认同, 是对客家族群自身历史记忆与价值体系的认同。客家文化运动, 则是客家族群认同的实践。

关键词: 客家; 族群认同; 文化认同; 表达; 实践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14)09-0187-05

族群认同是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随着客家研究由“文化—民系”向“认同—族群”范式的转变, 族群认同成为客家研究的重要范式。客家具有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 这种认同是建立在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的基础之上的。族群认同通过文化要素表现出来, 族群是基于共同的文化而认同。正是由于客家的族群认同, 众多的客家文化运动才能持续开展。本文通过梳理族群与文化的相关定义及对客家文化结构进行解构, 拟从文化的表述与实践层面来探讨客家的族群认同。

一、族群与文化认同

“族群”是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界用来研究部落与种族的一个概念, 国外对族群的研究相对较为成熟,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笔者拟选取几个比较权威性的定义来对其加以解释。

根据哈佛大学N.G.格拉泽和D.P.莫尼汉的定义, “族群是指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 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具有宗教的、语言的、习俗的特征, 以及

其成员或祖先所公有的体质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1]在这个定义中, 文化和社会因素是影响族群形成的最主要因子, 甚至可以说是族群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再如《麦克米伦人类学词典》对族群的定义: “族群是指能自我区分或是能被与其共处或互动的其他群体区分出来的一群人, 区分的标准是语言的、种族的、文化的……族群的概念联合了社会和文化标准, 且族群性的研究的确集中在族群间的互动及其认同的文化和社会的关联过程中。”^[2]这个定义强调的是族群的社会文化属性, 认为诸如语言、种族、文化等因素才是区别族群的标准。马克思·韦伯认为: “某个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 或者由于迁徙中共同的历史记忆, 而对他们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 这种信念对非亲属的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 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3]在韦伯看来, 文化相似或共同的历史记忆对族群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韦伯对族群的定义为社会人类学界所广泛引用, 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以上所引述的三个关于族群的定义都强调文化在族群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文化才是划分

收稿日期: 2014-03-22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JD1496);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JD1156)

作者简介: 陈海斌(1986-), 男, 江西抚州人, 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族群区隔的标准与界限。正是由于族群间文化的差异,才形成了族群的心理分野与文化边界。挪威著名人类学家巴斯从族群的排他性和归属特征来界定族群的边界,提出著名的“族群边界”理论。巴斯认为,一个族群的边界,不是地理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一个群体通过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斥他人^[4]。从巴斯对族群边界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族群文化才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

澳大利亚大学历史系梁肇庭教授受施坚雅的宏观区域理论和人类学族群研究的启发,考察了有关客家和操客家语的“棚民”认同的来龙去脉,开始了对本土语的批评论证。在他看来,客家认同的内容虽因历史条件和语境的不同而改变,客家“棚民”主要是因自身共同的历史记忆与价值观念而产生对本族群的认同^[5],而这恰恰表现为对族群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指特定个体或群体在文化交往或文化碰撞中,从对方文化的历史渊源、文化特征、文化价值和人文底蕴中找到彼此共同点或相似点,从而促进彼此之间的亲和与凝聚^[6]。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这种共识与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准则与价值取向,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因此,文化认同也表现为对其文化的归属意识^[7]。文化认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是人类文化存在与发展的主位因素。一个族群只有对自身的文化认同,才能够对该族群产生认同与归属意识。

二、客家族群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族群在迁徙与定居过程中基于自身历史记忆与文化积淀而建立起来的,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核心。客家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其主体是中原文化,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文化观念构成客家文化的价值基础与文化逻辑。客家在定居赣闽粤边后经过长期与当地的畬、瑶等族接触并吸收其优秀文化,创造了特色鲜明的客家文化。客家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的族群,文化认同是其认同与归属的最主要因素,文化成为客家人区分“我群”与“他群”的标准,是客家族群边界的界限。

族群共同的历史与遭遇是客家认同的基础性要素。客家是历史上由于战乱中原汉民经过多次艰难迁徙而形成的一个族群,共同的迁徙历史构成客

家独特的历史记忆。在迁徙与定居的过程中,客家人又经历了与当地争夺生存资源和空间的族群斗争,为了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又历经了艰难的入籍过程。清代晚期至民国初期,客家人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广府人作为社会的主导,一直歧视、排挤客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客家的精英开始注重社会话语权,通过调查、考证、史籍文献等,强调客家为汉族正宗,是从中原迁徙而来的“衣冠旧族”。罗香在199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将客家与中原土族联系在一起,建立了客家人的文化自信心与文化认同。客家人是中原正宗的观念,在形成和强化客家人的文化认同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8]。

客家文化认同的建立,让处于社会边缘状态,尤其是流落海外的华人,从这种观念中找到了归宿,唤醒了沉睡的历史记忆,建立起与中华正统文化的血缘联系。海外客家人在异国他乡仍然眷恋着祖国,从来不会忘记自己是客家人,不会忘记自己的根在大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海外客家人依然认同中国文化,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客家人对根的追寻就是对文化的认同,那么,海外客家人的族群认同意识为何如此强烈?

海外客家人远离祖国,在客居地无法保持像大陆一样整个村落的客家后裔,这些人往往分布比较零散,无法保持有效的联系。在客家先民向海外迁移时,由于船只的承载能力有限,一艘船搭载的通常是不同姓氏的各姓人群,宗族被人为地分割,血缘联系从此不在。正如汤因比对陆上与海上迁徙的对比那样:“跨海迁移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缘关系,一艘船只能装一船人,而为了安全的缘故,如果有许多船同时出发至异乡建立家乡,很可能包括许多不同地方的人——这一点和陆地上的迁移不同,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血缘的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9]在海外漂泊的客家人,往往要经受各种艰难险阻,才能在异国他乡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在当地又无法得到同乡和宗族的资助与扶持,这时家国意识便油然而生。海外客家人依靠着中原汉文化的精神给养,才能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正是凭借着对家国家和大陆原乡文化的眷恋,海外客家人才能不忘祖宗声,即使是十数代之后也仍然将客家话视为自己的母语,保持自

己独特的客家方言。尽管在面临寄居国文化同化的危机，客家语被严禁时，海外客家人也要教自己的子女学说客家话，这种对客家方言的执著反映的是客家人对客家文化的认同。

随着客家族群的繁衍与播迁，客家人的族群意识不断增强。客家认同意识从政治、经济层面转向文化层面，并通过与客家同乡的交流，从文化血缘上的族群认同上升、扩大至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认同^[10]。尤其是近年来开展的客家公共活动，如公祭黄河、客家祖地寻根、拜谒黄帝陵、建立客家公祠等，都显示客家人对族群文化乃至民族—国家的认同。

三、文化结构：客家族群文化认同的表达

文化结构是文化存在的内在本体，中国文化包含众多的子文化（或族群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文化结构，客家文化也一样。根据程裕祯对文化结构的分层，文化结构可以分成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11]。程裕祯对文化结构的划分准确地把握了文化的分层和内在结构，具有权威性，被学术界广为认可。

首先，物态文化是指物质生产及其产品的总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物，如人们的衣、食、住、行^[12]。客家文化的物态文化则主要表现为客家服饰、客家饮食、客家建筑等外在的物质实体。客家人在经历了长途的迁徙后想念家乡的美食，如饺子，可是定居的赣闽粤边不产面粉，于是客家人就奇思妙想地用豆腐代替面粉，在豆腐中加入馅便成为美味的“饺子”，这“饺子”又被称为酿豆腐。吃“饺子”在客家地区是一种很普遍的民俗，已经成为客家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这种随处可见的日常民俗蕴涵的却是客家人对先祖的崇敬与对中原文化的追忆，“饺子”见证的是客家人辛酸的迁徙历程与艰难苦涩的定居史。客家人聚居在一起吃“饺子”，手中的“饺子”成为勾起他们共同历史记忆的载体，由此他们想到的是先人的迁徙、拓荒，甚至是与土著为争夺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而引起的械斗，因此“饺子”中浸渗着客家的族群意识，是客家族群文化的凝聚。

客家建筑是客家物态文化的典型外在表现，客家建筑折射的是客家族群的历史与文化，是一个族群文化播迁和发展的见证。客家先民迁居于赣闽粤边，由于动乱的社会环境，客家先民建造了集家、

祠、堡为一体的建筑，用于防御盗贼与寇乱。客家人将中原的建筑形式与客家地区的生态环境、自然地理相结合，创造了独特的民居建筑，如粤东的围龙屋、闽西的土楼、赣南的围屋等。这些民居建筑不仅适应了当地的自然地理特点，还是离散、流亡的人生经历与历史记忆在文化中的积淀与呈现。围龙屋等客家民居正是适应了客家人对人生逼仄等生存压力的一种空间创造，是客家人生存伦理的一种文化表述，反映出客家人的文化逻辑与价值观念^[13]。民居建筑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客家民居人文荟萃，每幢高楼、每座华屋、每个村落都记载着许许多多神秘的历史信息，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它们是客家播迁发展的见证，聪明才智的结晶，从那里可以了解到一个姓氏的来龙去脉、一个宗族的发展变迁，可以看到曾经的辉煌^[14]。作为客家建筑组成部分的客家祠堂是客家人祭祀祖先的场所，同时也是祖先灵魂的栖息之地，承载的是客家人慎终追远的祖先崇拜的情怀，是一个家族兴衰的见证。在祠堂里，子孙可以看到先祖在此地的开基立业和宗族的繁衍发展，可以看到客家民系的迁徙历程。客家人的祖先崇拜在祠堂中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正如刘晓春所说：“遍布客家地区的祠堂建筑群似乎向人们昭示，他们对祖宗的崇拜之虔诚令其他民系的人们难以望其项背。”^[15]

其次，制度文化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16]。客家的宗族制度是客家文化在制度层面的体现，客家的宗族制度是依据儒家的宗法模式建立起来的用以规范族人行为的家族制度。客家宗族制度是儒家文化的变体和映征，凝聚着客家人对传统“孝”文化的坚守。客家地区宗族制度发达，每个宗族都修有族谱记载世系以便统合族众。客家的宗族文化发达，林林总总的祠堂就是见证。在客家地区还存在着同姓或异姓联宗的现象，不同的宗族通过追认一个共同的开基祖而确立同宗关系。据饶伟新的研究，“明末清初以来定居在赣南的闽粤客民通过编修联宗谱、建立联宗组织从而建构共同的宗族，这些原先毫无关系的外来客民，通过联修宗谱和建立同宗关系，逐步整合成具有共同祖先和以联宗谱为纽带的文化认同群体，今日的赣南客家就是这一文化变迁和社会重组的历史产物”^[17]。不同姓氏宗族的联宗表明，对文化的追寻超越了血缘，一姓宗族的认同可能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血脉相连,可是异姓联宗只能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因此,从客家文化的制度层面上看,客家的族群认同更多地表现为对共同文化的认同。

再次,行为文化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它是一种社会的、集团的行为,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18]。客家民俗便是客家文化中行为文化的代表,是客家文化的积淀,是客家人思想和精神文化的结晶,是客家民系优秀文化的展现。门榜是赣南上犹客家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之一,悬挂门榜已经成为上犹客家人的习俗。门榜,即刻于客家民居正门门额上的题词,多由四个字组成,标志着这个家族的血缘、历史和荣誉。其内容丰富多样,或追叙姓氏源流,或彰明祖先业绩,或标明家风、家训,不一而足,蕴涵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19]。上犹地区的门榜主要分为四类:姓氏源流;源于祖先的传说或史实;源于本族先人的字号或官职;对祖先文化的推崇^[20]。上犹客家的门榜文化是上犹客家人祖先崇拜的载体,寄托着对祖先的追念之情,许多门榜又体现出崇文重教的意蕴。上犹的门榜文化浓缩了中原传统文化,门榜是客家人向往中原文化的物质形态表达,是对根在中原的追忆与眷恋。因此,门榜不仅仅是一种民俗,更是客家族群文化认同的表达。

最后,心态文化是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21]。客家心态文化作为客家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的是客家族群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及处世态度,是客家族群人文精神品格的折射。客家人作为中原南迁的汉民,崇文重教,重视对子孙的教育是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文化特质。流传于客家地区的童谣“月光光,读书郎,骑白马,过莲塘”及“生子唔读书,不如养肥猪”等都深切地表达了客家人对文化和对知识的追求。客家地区的宗族普遍设有族田、学田、义田用以支持族中子弟参加科举,部分宗族还开办有私塾、族学等性质的宗族教育,聘请有才学之人担任教师。耕读传家是客家人崇文重教的重要体现,晴耕雨读,耕读寄寓的是客家人不忘儒家文化的传统,是对优秀文化的渴望。从客家人的崇文重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客家民系的人文精神和理念。客家人一直延续这一传统,也是海内外客家人对族群文化认同的重要方面。

再如客家地区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积淀于客家文化中。民间信仰与族群的族群性与文化性格是分不开的,通过民间信仰对族群文化内核的形塑,族群的核心价值得到了认同。明跃玲对五溪地区苗族盘瓠信仰的研究也表明,在族群边界的互动中,为了避免族群认同的削弱而导致被周边民族同化,他们又通过宗教仪式及生活习俗等自我认同和归属仪式维护族群边界,从而维持着自己的族群认同^[22]。客家人通过对神灵的祭祀来寄托自身的文化诉求和心理皈依,希望通过神灵这一文化象征来增强客家民系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客家民间信仰使客家人通过神灵维护了自己的族群边界,维持着对民系的文化认同。

客家文化结构是客家文化存在的内在本体,也是客家文化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的族群认同通过文化结构中的文化要素来展现,因此,文化结构中的文化要素是客家族群认同的文化表达。

四、文化运动:客家族群文化认同的实践

自改革开放以来,客家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众多的客家文化象征被构建。如宁化石壁“客家祖地”、“世界客都”梅州、“客家摇篮”赣州成为闽粤赣客家各自的名片,蕴涵着各自地域独特的客家历史与文化。与此同时,客家的文化符号也纷纷建立,如宁化“客家公祠”、南康“百家姓祠堂”、赣县“客家文化城”等。客家人建立这些文化象征的意义何在呢?其实,这些文化象征的构建是客家族群认同的表现,是族群文化认同的实践。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客家人回乡认亲、祭祖高潮迭起,回到祖居地查阅族谱、追溯姓氏源流、重修祖祠和祖坟,找寻自己的根。客家人对根的追寻其实就是族群文化认同实践的一种形式。

亨廷顿说:“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儿?’这些问题不仅对那些努力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中心问题,对更一般的国家来说也是中心问题。”^[23]在那个认同危机凸显的年代,人们失去了归属与认同,为此,重新建立对群体的归属与认同变得极为重要。正是在这种个人角色混乱的社会环境下,客家地区政府、学界、企业、社会共同努力开展文化运动,大批客家社团纷纷建立,客家

的学术会议不断召开,各种形式的联谊活动相继开展,客家地区的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客家电视台、客家影视也以多样的形式开展宣传活动。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是客家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大参会人数最多的活动之一,在这个全世界客家人的盛会上,海外客商投资家乡的建设,支持原乡的经济文化发展。客家地区通过开展客家文化运动,以“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为理念,搭建众多的交流平台,加强了与海外客家人的联系,海外客家人的族群认同也因文化运动的开展而不断增强。

2013年8月12日,“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和“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在“客家摇篮”赣州召开,活动由国务院台办和江西省政府联合举办,邀请了一大批台湾企业家和学者参会。这无疑是一次加强联系、促进和深化合作的极好机会。大会专门开设“客家文化发展与客家语言保存大会”,2位台湾学者发表了主题演讲,就客家文化和客家语言的传播和发展进行了探讨。台湾客家人积极参与到大会中来,许多参会者甚至用客家话交流,乡情意识浓厚。通过学术研讨会的形式,海峡两岸的客家人增强了对客家文化的理解,更加认同客家文化。

由上述可见,客家文化运动是加强海内外客家人联系的重要平台,对客家文化的传播和弘扬具有积极意义,对增强客家族群的文化认同具有重大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客家文化运动就是客家族群文化认同的实践。

参考文献:

[1]Nathan Glazer, Daniel P.Moynihan, Ethnicity—theory and Experienc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

[2]Seymour-smith.Charlott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M].London &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6: 5.

[3]Marx Weber.The Ethnic group, in Parsons and shils etal (eds.)THEORIES OF SOCIETY, VOL1 Gleeer Col[M].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61: 306.

[4]Barth, Fredirk.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M].Boston, MA: Little Brown, 1969.

[5]Sow-Theng Leng.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M].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6]李其荣.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美加新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分析[J].东南亚研究, 2008, (5): 69-77.

[7]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4.

[8]余达忠.文化全球化与现代客家的文化认同——兼论宁化石壁客家祖地的建构及其意义[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2, (1): 7-12.

[9]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130.

[10]周建新.族群认同、文化自觉与客家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 75-79.

[11][12][16][18][21]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13]周建新.在路上: 客家人的族群意象与文化建构[J].思想战线, 2007, (3): 17-22.

[14]林开钦.论汉族客家民系[M].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1: 231.

[15]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记忆与权力[M].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03: 11.

[17]饶伟新.清代赣南客民的联宗谱及其意义初探[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7, (4): 13-17.

[19][20]周建华, 李竞帅.从祖先崇拜到崇文重教——理学文化视野中的上犹客家民居门榜[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04, (4): 10-12.

[22]明跃玲.神话传说与族群认同——以五溪地区苗族盘瓠信仰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3): 91-94.

[2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129.

责任编辑: 吴晓霞